

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徐友漁 著



201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三)

港台書

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徐友漁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894-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Rebels of All Stripes: A Study of Red Guard Mentalities (in Chinese)

By Xu You-yu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894-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目的、方法、主要結論	1
一 研究紅衛兵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3
二 材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7
三 對西方研究成果的重視和借鑒	12
四 作者的基本觀點	16
第二章 文革前的教育、意識形態和 政治歧視	23
一 革命第一	25
二 蒙昧無知和野蠻	31
三 鬥爭哲學	37
四 階級路線	42
五 非官方因素：人性與文明的潛流	46

第三章 紅衛兵的區別和派別 53

一 地區差別	56
二 年齡特徵	63
三 保守派和造反派	68
四 造反派內的進一步分化：溫和派與激進派	81
(1) 全國派別鬥爭概況	86
(2) 三省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	100
(3) 溫和與激進的意識形態的分歧	109
(4) 兩派的一系列對立	115

第四章 造反的原因 125

一 共同原因	127
二 老紅衛兵	133
三 造反派	141
四 文革發動者的策略手段	156
五 結盟和聽命	164
六 文革是一場社會衝突嗎？	171

第五章 幻滅和覺醒 185

一 「聯動」的最先發難	187
二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193
三 上山下鄉	198

四 林彪事件	205
五 異端思想和書籍的影響	211

第六章 後果 223

一 退出運動後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一般狀況	224
二 獨立意識	228
三 道德危機	233
四 代際差異	240
五 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後的民主運動	247
六 未解決的社會矛盾	255

附錄一 參考文獻	265
----------------	-----

附錄二 被採訪者一覽表	298
-------------------	-----

附錄三 索引	309
--------------	-----

後記	313
----------	-----

第一章

導論：目的、方法、主要結論

1976年，身患重病、面臨死亡的毛澤東召見華國鋒、江青等人，向他們就自己一生業績作了一番總結。他說，他一輩子就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於第一件事，他自信持異議者不多；對於第二件事，他既清醒又悲觀地說，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從研究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和個人業績的角度看，他幹的第二件事更令人感興趣。這是因為，中共在國共之爭中獲勝，毛的作用在中共領袖中固然是突出和關鍵性的，但為中共勝利作出貢獻的還有許多人。最近的材料表明，許多原先記在毛名下的功勞實際上應歸於別人。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則明顯地只打上了毛澤東個人的印記。準確地說，奪得政權是中共的集體業績，而文革則是毛澤東的個人事業（雖然單憑他個人也搞不起文革，就此而言文革的罪責不能僅由他一人承擔）。另一個使人對文革更感興趣的原因是，雖然中共奪取政權無論在近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不乏這樣的先例：一批在社會主導地位之

外的知識份子領導農民戰爭，推翻了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以地主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權，實現改朝換代。而文革，不論從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的角度看，都是空前的，而且很可能是絕後的。如果說毛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可以勉強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的話，那麼只有文革才呈現了毛反文化、反現代化的性格。

研究文革的目的顯然不應僅在於對毛澤東個人的興趣。文革的最終動因是毛的個人意志，而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又在於他和執掌中共黨政機構領導權的其他人的關係，在於黨內的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中共的政策特徵和行為特徵。此外，文革使中國近十億人捲入一場混亂和內鬥，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人在運動中的表現，與中國人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與他們的思想和心理特徵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文革也就是研究中國的社會和文化。

不言而喻，研究文革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比起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反省和懺悔，日本人的態度使所有的中國人憤怒，因為他們對過去的侵略暴行缺乏認真、負責的反省。但我們亦當自問，對於被我們稱為一場浩劫的文革，我們又作了多少認真的反思呢？文革中的受害者大多數現在還活着，積極參與、狂熱投入的一代人現在正是中國的社會中堅，但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多少人能夠說出一個所以然呢？也許，對不同的人，文革意味着不同的事，也許，對大多數人而言，文革中的是非恩怨是一筆糊塗賬。在80年代初，中共領導人多次宣稱，中國再也不會發生文革了，但並沒有過多久，在80年代中期，領導層中就有人不斷地掀起大批判式的政治運動。在80年代末，同樣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比文革中更慘痛的血案。兩次事件極為相似，民眾舉行和平請願和示威，官方則誣之為「反革命暴亂」，差別僅在於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流的血要多得多。而更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後一次鎮壓的下令者是第一次事件的受

害者。也許，再不會有億萬人像在文革中那樣發瘋般地搞內鬥了，但誰能擔保這一點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一個半世紀前的鴉片戰爭始，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而文革則是在無外患情況下自己搞起來的最激烈的反現代化運動，它使自1949年以來以階級鬥爭為名義而進行的內鬥，對國計民生的危害達到了頂峰，總結這種最極端和觸目驚心的反面事件，對於中國今後的現代化建設是有益的。現在才開始作系統研究顯然為時已晚，但對於有健忘症的中國人，對於中國令人憂慮的未來，這項工作永遠也不會太遲。

一 研究紅衛兵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紅衛兵，即一度使世界感到惶恐、驚懼的紅衛兵，本書研究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由於這些行為極其不同尋常（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造反」），作者將努力揭示他們行為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原因，本書既把紅衛兵當作形成組織，歸屬於某一派別的群體來研究，又將他們作為單個對象來研究。因此，作者將闡明紅衛兵的派別鬥爭、理論思潮，也將描述他們獨特的心路歷程，說明不同的人是如何狂熱地捲入運動，其中有些人又是如何開始清醒並否定文革的。本書將仔細分析文革在這一代青年身上造成的後果，顯然，文革中罕見的刺激和形勢的戲劇性變化使這一代人獲得十分獨特的經驗，政治運動的狂潮早已退落，但這種經歷在精神上的烙印卻是長期難於消除的，文革將通過這一代人的思想和行為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社會產生影響。

作為一項研究，也許有必要首先說明，本書所說的紅衛兵指哪些人，他們一共有多少。有人使用「紅衛兵」一詞，僅指在各地首批

成立組織，從1966年5月底到年底活躍的那批人（在北京被稱為「老兵」即老紅衛兵），而把後來活躍的更廣大的學生稱為「造反派」。首批紅衛兵中很多人和造反派學生中一些人均這麼使用「紅衛兵」一詞，對於老紅衛兵而言，他們不願把如此高貴和光榮的名稱讓與其他人分享，對於某些造反派而言，「紅衛兵」意味着血統論、「破四舊」^①，他們不想承擔這種惡名。但更多的人，包括海外各種人，把所有投入文革運動的青年學生都稱為紅衛兵，這也是中國較為流行的用法，本書取後一種概念。很難說這些人共有多少，哪怕得到一個大致可靠的數字都不可能，我們在這裏只能作粗略估計，以便對這個人群的規模有一個初步的印象。紅衛兵屬於1966年時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畢業這十來個年級的大中學（包括中等技術學校等）學生，也包括少量1966年秋季以及以後入學的所謂「新中學生」。由於文革的混亂和破壞，現在無法得到1966年的數字，作為參照的1965年的在校學生數據是：高校67.4萬，各類中學1,431.8萬，小學生11,620.9萬^②，以在校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經常性地投入運動計，紅衛兵的人數下限為一千萬，上限可能為三千萬。事實上，在紅衛兵和非紅衛兵之間，即投入運動的學生和游離於運動之外的所謂「逍遙派」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因此，有的人寧願使用更寬泛的概念「第三代人」^③，對本書所說的紅衛兵，也可以做這種廣義的理解。

本書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其時間覆蓋長度如何？在中國大陸，人們習慣於說「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例如高舉、嚴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這也是官方的說法，照此說法，文革發動於1966年5月（標誌為中共中央於5月16日發布的一份綱領性文件，一般稱為「五一六通知」），結束於1976年10月（標誌為「四人幫」的覆滅）。而西方學者一般把文革的時間界定為從1966年5月到1968年底（紅衛兵退下政治舞台）或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這將近三年的

時間之內（比如看書名《中國學校中的文革，從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④）。在某些情況下，這不僅是簡單的分期問題，而涉及到對於文革評價的理論上的爭論。比如，陳佩華（Anita Chen）在〈清除對於紅衛兵運動的錯誤觀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一文中認為，文革十年說對應於中共官方的解釋模式，它忽視文革中人民的作用，特別是紅衛兵青少年的作用，而文革三年說對應於海外學者「社會衝突論」的解釋模式，這個模式把群眾背景置於中心位置^⑤。就研究紅衛兵而言，似乎取三年分期說較好，因為紅衛兵在1968年秋就退出政治舞台，從那時起，絕大多數人被迫上山下鄉。由於本書的研究不限於紅衛兵在三年活躍期內的行為，不僅要追蹤他們脫離運動之後的思想發展變化，而且還要溯源於他們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討論問題的時間幅度大到從50年代至80年代，因此，文革究竟是三年還是十年，就不太重要了。

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意圖，分析中共最高層的權力格局，各派勢力在運動過程中的消長，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文革遠遠超出了宮廷鬥爭的範圍。人們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場把近十億人捲入其中的群眾運動。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廣大群眾的參與：他們當時為甚麼會有那麼離奇、狂熱的舉動和心理，這是一個超級魔術師催眠的結果，還是有其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驅使他們處於顛狂狀態，鬥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個人的切身利益？

研究文革中廣泛的群眾參與，是一個十分龐大複雜的課題。不少學者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於紅衛兵，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紅衛兵

在群眾運動中首先是起了先鋒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還起了領導作用。不論從自發的意義還是從被操縱的意義上來說，紅衛兵都是最早動員起來的群體，通過他們的宣傳、串連，運動發展到全國範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工人、農民、其他社會階層和職業集團的人投入運動，是紅衛兵鼓動起來的。在其後的階段，當紅衛兵和工人、農民等在派別組織上形成統一體或結成聯盟時，在大多數情況下起領導作用的仍然是學生。這表現在每一大派群眾組織的行動綱領和戰鬥口號往往由紅衛兵提出，表達本派政治主張的理論也是由紅衛兵制定。在多數情況下，群眾組織與黨、政府、軍隊中的後台（幾乎無例外地一定有後台）的聯絡工作也由紅衛兵擔任。因此，對於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文革較遠的人而言，紅衛兵和文革幾乎成了同義詞。另一方面，從研究的角度看，以紅衛兵為題材也要容易一些，因為有關學生的材料要比其他材料多得多，而紅衛兵一代人由於最為珍惜自己的那段經歷，採訪起來也容易一些。

這當然不是說，紅衛兵可以作為群眾組織的典型，他們代表了參與運動的所有群眾的行為、思想、社會特徵。一個最大的區別是，就參與運動的動力而言，學生的意識形態因素要大大超過其他群體，而實際利益的考慮要大大弱於其他群體，雖然這兩種因素對所有的參與者都起作用。

就研究文革的影響和後果而言，紅衛兵是各社會集團中最應受到重視的對象。因為，與工人、農民和其他人相比，紅衛兵在文革前後期思想變化最大。他們最敏感，最早、最強烈產生上當受騙的感覺，而且以各種方式把憤懣情緒表達出來。他們的命運受文革影響最大：在運動初期是天之驕子般的「革命小將」，而到後期則被發配到農村——中學生到生產隊、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大學生中許多人到部隊農場。命運改變使得許多人深入了解和研究社會，對政

治和歷史進行思考，因此，文革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最深。如果說，參與文革這段經歷對所有的人都有影響，並通過這些人對向現代化過渡的中國社會產生影響，那麼這一點在目前正當壯年，不少人作為社會中堅的紅衛兵一代人那裏表現得最為明顯。

二 材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和所有的紅衛兵研究著作一樣，本書的寫作依靠下列資源：各種出版物——官方的、非官方的，中國大陸的、海外的，文革期間的、文革之後的，包括各種人的回憶錄、文章和專著，以及與前紅衛兵的訪談。唯一的特別之處是，本書作者在研究中依靠了文革中的個人經驗。下面對各類材料的來源、價值和利用情況加以說明，以期有助於讀者用批判的眼光來衡量本書的結論。

最容易到手的材料是官方的公開出版物，比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中國青年》雜誌等等，還有各省市的報刊雜誌。應該說，這類材料的價值是極為有限的，其用處基本上是作為排列文革中各種事件的時間坐標。當然，有經驗和有技巧的解讀者也可以從中篩選出個別有用的信息。與這類材料相近的是文革中以中央文件形式下達的官方指示和決定，這種在文革前屬於保密範圍的材料在文革中和文革後很容易看到。它們的價值大大高於宣傳出版物，因為它們談的是實質性問題，而報紙雜誌刊載的是官方要人們相信的東西。在許多情況下，中央文件既反映了官方的意圖，也反映了運動的真實情況，而且，紅衛兵的許多行為往往是對某一個中央文件的反應（比如堅決擁護或變相抵制中央關於解決某省問題的決議）。與此類似還有大量的「中央首長講話」，各級領導、各種機構的「情況反

映」等等。它們屬於「內部材料」，而人們都知道，在中國材料越是「內部」，其真實性就越大。這些材料，有的出自官方或非官方，有的僅由群眾組織翻印。它們當然並非件件可信，但由於同一內容的材料往往有好幾個版本，對比參照之下，較為容易確定其可靠性。

第二類材料是當年紅衛兵的出版物，這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基本材料。全面和透徹地掌握這類材料有助於深刻、準確地理解紅衛兵的行為。這種材料當然並非十分可靠，其中充滿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派性偏見和相互攻訐之詞，研究者需要把不同派別對同一事件、過程的描述作對比，鑒別不同說法的真偽和可信程度之後方可使用。在處理這一類資料時，是否親身參加過文革，以及是否在群眾組織的決策圈或宣傳機構中工作過，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紅衛兵出版物和官方宣傳品一樣，以一套特定的話語模式和習慣描述事實、傳遞信息、作出評價，若照字面來理解，就會發生誤導，或不知所云有如墮入五里霧中。研究的結論是否正確和有價值，往往依賴於研究者閱讀材料時對於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前理解」，許多有意義的判斷不是在閱讀材料之後依靠歸納方法得到，其過程恰恰相反：一個有準備的研究者往往已經有一些初步假定或判斷，他知道自己應該通過甚麼途徑，找到哪一類材料來證實或否定那些初步設想。在基本條件大致可以滿足的情況下，重要的不是閱讀的數量，而是已經存在於頭腦中的概念。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海外不斷有前紅衛兵的文章或回憶錄發表，這是一種有相當價值的資料來源，因為幾乎所有的作者都有豐富的經歷，其中不少人還是當年的重要人物或活躍份子（如楊曦光、鄭義），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中能從新的視角反觀文革，能坦率真實地講述自己的過去，或能系統、全面地回顧自己的經歷（如凌耿的《天籟》、高原的《自來紅》），大陸的研究者不易得到這類資

料，我利用幾次出國作訪問研究的機會，並借助於朋友們的幫助，盡可能完全地、及時地獲得這種材料。

大致從80年代後期起，大陸的正式出版物（包括中共黨史研究刊物）中陸續有一些關於文革的資料或研究論文發表，儘管這些論著的觀點仍囿於官方意識形態，但其中包含了若干有價值的史料。收集這類材料對於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儘管要花很多時間作沙裏淘金的工作。附帶說一下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的說法是不準確的，他把這類文獻劃分為兩類，一類提供的是「不代表黨中央聲音」的信息，另一類提供黨所認可的信息^⑥。實際上，所有這些材料都不正式傳達黨中央的聲音，另一方面，在大陸目前的政治條件下，所有出版物的觀點都不可能與黨的精神明顯相悖。它們不是判然有別的兩類，而是在官方設定的思想界限之內表現出十分教條或多少客觀公正一點的傾向。

本書寫作最費時間和精力的準備工作是採訪紅衛兵，我曾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成都、鄭州、濟南和一些小城市作過採訪，了解當地的運動情況和紅衛兵經歷，也在北京、海南、香港等地與來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內蒙古、西藏、新疆、江西、湖南、貴州、雲南、江蘇等地的前紅衛兵作過廣泛訪談。我正式採訪的對象大致有一百多人，選擇採訪對象時主要考慮了以下幾方面因素：一，地域的廣泛性，盡可能與每個省份的人交談，至少不能沒有某個大地區（如東北三省，西南三省，華東、華南、華北諸省，西北的幾個自治區等），同時要兼顧小城鎮、農村、少數民族地區；二，年齡層次的代表性，從大學高年級學生到初中一年級學生，甚至1967年以及以後進中學的所謂「新中學生」，即1966年的「紅小兵」；三，組織派別的代表性，從曾當過動「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西糾」（「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北京老紅衛兵，到各種派別、激進程度不等的造反派，都進行訪談，他們

出身於不同家庭，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在學校的地位不同，思想變化過程不同，現在的社會地位也不同（有司局級幹部、教授，也有個體經營者）。訪談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一對一交談，這種方式可以談得比較深入，有時甚至涉及個人隱私，對於了解人們的心路歷程大有好處；二是小組專題討論，一般人數為五、六人，往往來自同一地區、同一派別、同一學校甚至同一班級，偶爾也有對同一話題感興趣的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這種形式有利於弄清一個地區、派別、一段時間的運動發展情況，因為人們可以相互啟發、糾正。

毫無疑問，相對於捲入文革的一千多萬紅衛兵，被調查訪問的一百多人實在是太少了。當然，在目前的研究條件下，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是不可能的，但我要強調的是，如果在調查方面有缺陷的話，那麼它主要不在數量方面，而在所代表的類型不充分。本項研究在調查方面強調的是「質」，即代表類型的豐富性、多樣性，而不在「量」。被採訪對象的選擇是精心考慮而不是隨機的。本項研究涉及到人的社會、政治行為，行為背後的動機，以及思想發展變化這類「高級」的活動，其重要結論不可能從統計方法中得出，至關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深入到紅衛兵運動中，以及對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政治、社會、群眾心理諸方面有深入的理解。

由於研究的需要，調查和訪談的對象不可能只代表紅衛兵總體的一般狀態和平均水平，而是偏重於其中的活躍份子，他們之中有的是重要的或知名的頭領，有的是較有影響的理論家，即寫出過轟動一時的大字報的人，甚至包括少量的武鬥積極份子及指揮者。他們的講述構成了一幅豐富多采、色彩斑斕的圖畫，而實際上文革的圖景要單調和灰暗一些，因為畢竟大多數人是隨大流，在文革結束後隨遇而安的人。這一點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場運動所包含的重大事件和行為，是由最活躍的參與者作出，或在他們帶領下作出的，而其中涵含的最有價值的思想，也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才能體

現。另外，本研究強調文革的影響及後果這一方面，而這更需要追蹤文革的活躍份子才能做到，因為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影響社會、影響周圍人群的願望和能力最強。

就像不能不加分析批判地相信報刊文字材料一樣，隨時警惕訪談中的錯誤也是至關重要的。雖然訪談往往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但我不時能感覺到以下一些問題。一，由於時日甚久，講述者的記憶容易模糊、混亂（這一點不是大問題，因為可以用其他講述，尤其是用各種文字材料校正）；二，除極少例外，人們易於帶着派性偏見回憶和評價往事；三，幾乎所有的前紅衛兵首領都迴避兩方面問題，一是他們在政治鬥爭中的權力欲望與技巧，二是本派組織與某種後台（中央文革、當地駐軍等等）的關係；四、用文革後的觀念，新近學到的理論宰制當初的事實，我將此稱為「記憶受新思潮的污染」。

在研究的準備和寫作過程中我強烈地體會到，我本人的文革經歷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不但在本校和成都市是十分積極活躍的人，與一派的最高頭領有密切關係，熟悉紅衛兵組織的內部運作機制，直接參與和目睹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且從1967年夏季開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較為自覺和正式地把文革當成一個課題來研究，這使我們努力系統地了解全國各地運動情況，並打破派性界限，與各派中的重要人物或愛思考的人交流切磋。這種經歷使我比較容易去尋找有價值的採訪對象和閱讀材料，在訪談時迅速得到信息，使談話盡可能坦率、深入，對各種書面和口頭的矛盾表述作出清理、匡正，在充斥意識形態話語和派性宣傳口號的材料中解碼並篩選出有用的信息，發現易於為他人忽視的研究線索，等等。當然，不論我反思自己的經歷，還是總結與眾多前紅衛兵交談的經驗，都會看到，如果缺乏自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那麼親自經歷文革雖然有諸多方便和好處，但同時也極易落入思想的樊籠，因為一段轟轟烈烈的經歷很容易使人自以為是，難於擺脫自我中心的偏見，而當年